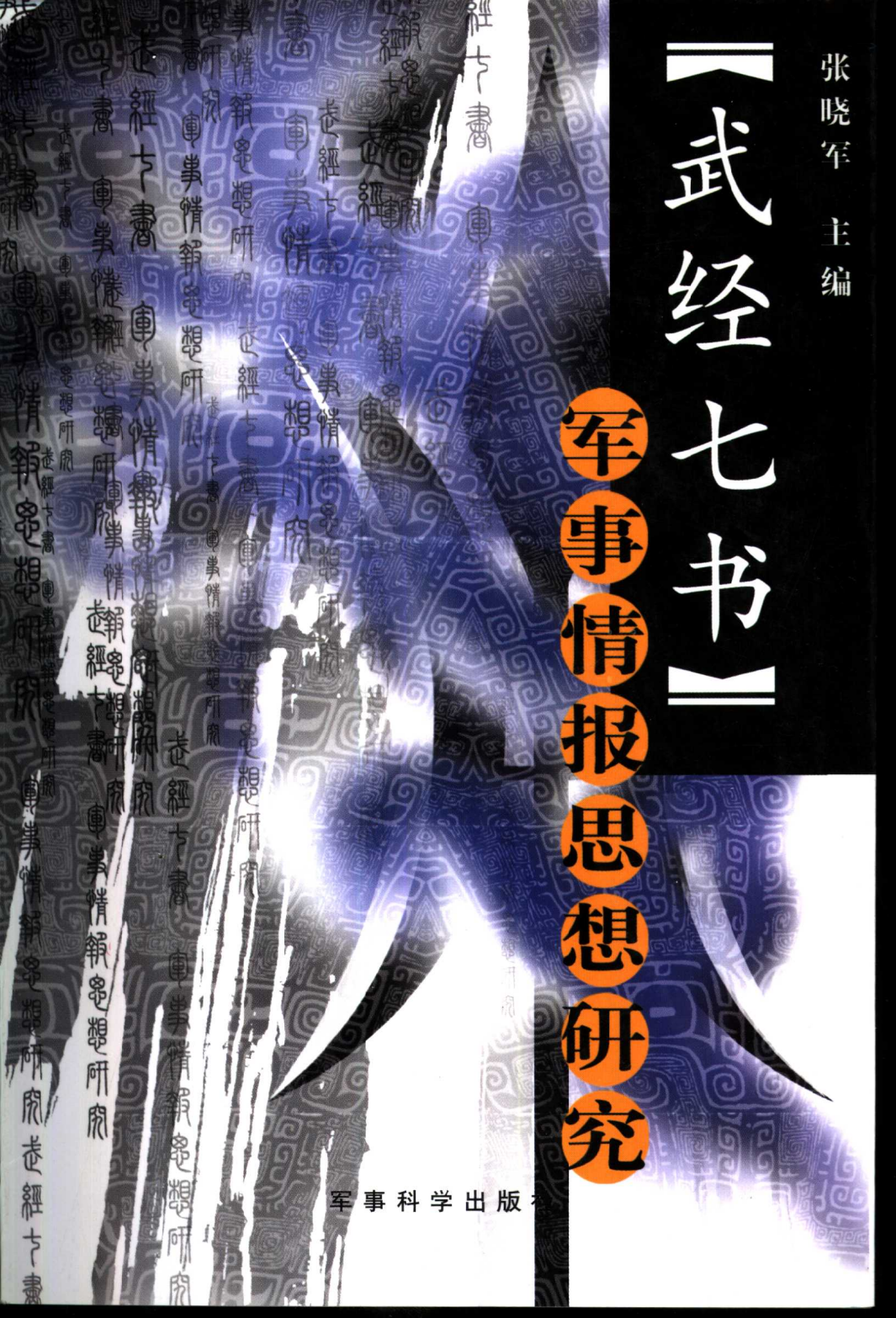


张晓军 主编

《武经七书》

军事情报思想研究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重点科研项目

《武经七书》 军事情报思想研究

张晓军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张晓军主编.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12
ISBN 7 - 80137 - 499 - 1

I. 武… II. 张… III. 军事 - 情报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087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8.125

印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1 千字

印数:1 - 1500 册

书号:ISBN 7 - 80137 - 499 - 1/E·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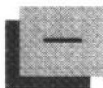
定价:14.00 元

目 录

绪论	(1)
概论	(13)
第一章 引论	(13)
第二章 情报认识论	(19)
第一节 情报客观性	(19)
第二节 情报价值	(21)
第三章 情报收集思想	(25)
第一节 收集内容	(25)
第二节 侦察途径	(28)
第四章 情报分析思想	(30)
第一节 情报分析的理论基础	(30)
第二节 情报分析方法	(31)
第五章 情报应用思想	(36)
第一节 因敌变化	(36)
第二节 隐真示假	(37)
第三节 心理作战	(39)
第四节 情报防护	(40)
第六章 情报思想评析	(42)
第一节 情报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42)
第二节 情报思想的特点	(44)
第三节 情报观比较	(46)
第四节 情报思想的总体局限	(52)

第五节 启示	(55)
分论	(60)
第一章 《孙子》	(60)
第一节 “知”与《孙子》的理论体系	(60)
第二节 《孙子》军事情报思想	(70)
第三节 《孙子》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85)
第二章 《吴子》	(106)
第一节 《吴子》军事情报思想	(106)
第二节 《吴子》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117)
第三章 《司马法》	(129)
第一节 《司马法》军事情报思想	(129)
第二节 《司马法》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145)
第四章 《尉缭子》	(153)
第一节 《尉缭子》军事情报思想	(153)
第二节 《尉缭子》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162)
第五章 《六韬》	(184)
第一节 《六韬》军事情报思想	(184)
第二节 《六韬》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195)
第六章 《三略》	(211)
第一节 《三略》军事情报思想	(211)
第二节 《三略》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218)
第七章 《李卫公问对》	(227)
第一节 《李卫公问对》军事情报思想	(227)
第二节 《李卫公问对》军事情报论述选注	(237)
参考书目	(248)
后记	(251)

绪 论



军事情报的研究与军事情报实践相辅相成,其悠久的历史,是与人类战争的发生发展相伴随的。以《孙子》十三篇成书为标志,约在 2500 年以前,中国就已经诞生了比较系统的军事情报思想。

然而,军事情报学这一“研究军事情报的特性,揭示军事情报工作的规律,并指导其实践的学科”^①,作为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之一,其历史却仅有 10 多年。

积淀丰厚的历史与作为学位学科的短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出现了如下的矛盾现象:中国历代兵书中有着大量的军事情报思想,但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却非常欠缺。这种状况已经明显地反映在该学科近年来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中。专业研究多集中于应用层面,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有人问津,至于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

由于军事情报思想与军事情报史是军事情报学学科不可或

^① 糜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58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所以，在该学科的概论性专著中，将军事情报思想列为专章也就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军事情报思想研究相当薄弱，于是，这类章节的写作，便以跳跃式或以点带面式写法勉强为之。这里仅举两例：

1994年出版的由彭理中先生撰写的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教材《军事情报学导论》，是一部体系比较完备、在理论研究上能够给人以启发的著作。该书以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孙子与毛泽东的军事情报思想，以代替关于中国古今的军事情报理论论述（该书第四章为“孙子知彼知己论——情报认识论的基础”，第五章为“毛泽东军事情报思想——我军情报工作的指南”）^②。

1999年由阎晋中先生撰写的《军事情报学》一书，在“军事情报简史”一章中，以“《孙子兵法·用间篇》”（包括其在中国军事侦察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概括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的全貌^③。

作为军事情报学概论性的专著，作者如此处理，也自有道理，因为概论性著作的每一章节背后都应该是学术界相应方向研究积累的体现。但反过来说，这种跳跃式或以点带面式写法，却恰恰难以充分反映古代军事情报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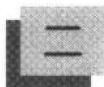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兵书战册浩如烟海，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见于著录的，便逾3000余部，存世的逾2000余部，而大量的非兵书类的“经、史、子、集”中亦散落着丰富的论兵文字。对其中的军事情报学思想加以全面整理与研究，是一项浩大艰难的工作。

① 廉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② 彭理中：《军事情报学导论》，138、207页，军事谊文出版社，1994。

③ 阎晋中：《军事情报学》，38~40页，时事出版社，1999。

程。作为这一领域的初步研究,该从何处入手呢?我们以为,以《武经七书》为切入点,来展开对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研究,是可取的途径。



《武经七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是北宋朝廷作为官方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元丰三年(1080年)皇帝赵顼(即宋神宗)诏令国子监“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国子监司业朱服主持其事,参与者有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校订工作历时三年余,于元丰六年(1083年)告竣。

作为武学经典的这七部书是从当时流行的数百部兵书中挑选出来的。《武经七书》基本包括了从先秦至唐代中国军事思想成果的代表作(《孙臆兵法》亦为先秦兵学的重要代表作品,但汉末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宋以后,遂成学术疑案,直到1972年4月在银雀山出土,始重现于世),因此,《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思想应当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

编入其中的七部兵书虽然是七部独立的著作,但是,自《武经七书》颁行之日起,它们就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作为宋代官方“立之学官,亦以之试士”的武学教材,《武经七书》不仅对宋代武学建设意义重大,而且其影响泽及后世。在建构古代军事家的主体知识结构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明确关键概念内涵,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和前提。研究《武经七书》的军事情报思想,我们需要明确的概念应该是“军事情报”。不然,我们不仅因无标准,对原文的取舍无从措手,分析论述无法保持前后逻辑的一贯,而且也无法与读者形成顺畅的沟通交流。

有些重要甚至堪称权威的军事文献把军事情报的内容设定在敌情,例如:

(1)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①

(2)198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②

我们认为,“情报”应包括“敌”、“我”、“天”、“地”(“天”、“地”等相关情况亦可归并到“敌”、“我”之中)等情况,理由如下:

一是我们研究古代的典籍,首先要尊重古人的原始含义。关于军事情报思想内涵,在《武经七书》中有明确的界定。这在《孙子》中表现得最典型。《孙子》对于“知”不仅有总论:“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计篇》);“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

①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64。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I》,5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用间篇》）；“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篇》）。而且有按照“知”的内容而进行的正反分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谋攻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形篇》）。在分论中，情报的内涵，得到了明确的界定。此外，从军事情报学的视角来审视《孙子》，其第一篇“始计”可解读为情报研判论。在孙子看来，定计的关键在于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周密的分析与判断，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对比分析（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判断，在正确的判断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将“知彼知己”对照论述，在《武经七书》其他六部书中亦时有所见，如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有如下一段论述：

太宗曰：“诚哉！朕尝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诚。”（《李卫公问对·卷下》）

二是《孙子》的界定，完整而周密。如果仅仅把情报的内容界定为敌情，那么，言胜言败都会论证失据；因为“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显然不应该只有敌方的情况，还应该包括“己”、“天”、“地”等内容。“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

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①

三是孙子关于军事情报内容的界定与思考不仅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实际,而且历经两千余年而颠扑不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②直到今天,在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孙子关于军事情报内容的界定与思考依然适用。1999年,在标志着信息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海湾战争10周年之际,美国出版了《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一书,该书是兰德公司“‘战略评估’丛书”(“Strategic Appraisal” series)中的一种。书的第六章,以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形篇》)”为引言,认为“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仍然是军事情报的最重要的内容,并明确指出:“关于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的需要,和‘知敌’同样重要”(原文为:As important as knowing the enemy is the nee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capa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location of one’s own forces.)^③。可见,孙子兵法对“知”的内容的阐述对我们今天全面、准确地把握战争中的情报内容,准确界定军事情报的概念,仍然是有启发性的。

所以,本书所采取的军事情报的概念与现在通行的军事情报概念不同,其内容包括“彼”、“己”、“天”、“地”四方面;如果进一步归并,“天”、“地”(相关的自然情况)又可以纳入“彼”(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494,490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494,490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③ Edited by Zalmay M·Khalilzad, John P·White.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in Warfare. [C]Washington: RAND 1999, P. 159.

“己”(我)两方面;而“彼”、“己”两方面,以“彼”为主,因为“知彼”需要突破“彼”方设置的重重“战争迷雾”,方可实现。

我们在本书所采用的军事情报概念,即以“彼”、“己”、“天”、“地”为内容;我们对《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即应以此为标准。

四

从现有的古代兵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成果来看,通常见到的方法是,以现代情报工作的程序,如“侦察”、“整编”、“分析”、“研判”、“传递”、“保密”、“情报欺骗与反欺骗”等,作为对原书进行梳理、归纳与评析的线索。于是,现代情报工作的程序,也就自然被转换为古代思想研究著述的结构框架,研究的结论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两分法:有启发但也有局限,云云。但是,这样一来,不仅使学术研究几乎等同了对号入座的填空题,大大降低了学术研究的应有品位,而且还将古代经典蕴涵的完整有机的思想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六经注我”也罢,“我注六经”也罢,总得尽量尊重原著原意才对。这种尊重,应该以“两个进入”为前提:首先要进入原作的写作环境,即所谓“知人论事”;再者是突破背景语言障碍,进入原作的文本环境,即所谓“世远未见其面,覘文辄见其心”。这样做,说来容易做到难。就前者论,古代典籍,去时已远,许多著作连确切作者与成书时间都难于考稽;就后者而言,古今语言变化很大。要准确地理解原著的意蕴,除了要查背景、考身世而外,还需要通训古、明典故,然后才能揆情度理,贴近原著的意义。即使我们的研究还达不到深层次的“进入”,但是确立一个原则,在心中存留一警戒线,对矫正研究中的断章取义式的评论,保持学术研究的应有品

位,总是有益的。兹将我们把握的《武经七书》各书的军事情报思想特点,简述如下:

《武经七书》中有军事情报专论的是《孙子》、《吴子》、《六韬》三部书。

《孙子·用间篇》集中论述谍报问题,但孙子的军事情报思想远远不止《用间》一篇所论。作为中国古代兵书的经典,《孙子》论说的重点在“谋”,其论说的基点在“知”。知而能谋,谋而后战。或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伐兵攻城克敌制胜,谋略贯穿于军事斗争的始终;知为体,谋为用,知与谋始终相伴,如影随形。“谋”的重要内容是诡道,诡道的核心是“形人而我无形”,实质是围绕“知”而打情报战,即千方百计确保己方之“知”(先知、尽知、确知),扰乱敌方之“知”(迟知、漏知、误知),最高明的,则是使敌方知我所欲其知。孙子对诡道理论的充满辩证法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已经逻辑地包含了对“知”理论的全面深入开掘,因为“诈”与“知”其实原本就是权谋理论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知”,“谋”就失去了基础、前提和依据,没有“诈”,“知”也就失去了内容、作用和意义。兵以诈立,诈以知立;兵不厌诈,诈不厌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知”既贯穿于军事斗争的始终,也牵动着战争的各个相关因素。而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着理论家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对应性提炼。《孙子》以“计”篇始,以

“用间”篇终；“计”篇论情报研判^①，“用间”篇论情报的获取。首尾呼应。反映了孙子对战争情报规律的正确认识，也使得“知”在孙子兵法中具有一种维系整个理论体系结构的纲维作用。从“知”的角度入手，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梳理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从整体理论体系的角度着眼，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孙子“知”的理论的认识。

《吴子》有《料敌》一篇，专论敌情之研判。吴子开宗明义：“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而后对魏国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做了具体分析，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情、地形等方面，对六国的情况逐一地进行了分析；又指出何种情况可击，何种情况不可击。如果说《孙子·计篇》主要是战略情报研判理论的论述，那么，《吴子·料敌》篇就主要是援例阐发。《吴子·料敌》通过武侯发问，提出了：“观敌之外以知其内”的命题，涉及到如何透过现象看出本质以获悉真实情报的原则，《孙子·行军》则列举了三十余种通过相敌以便料敌的实例：“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① 台湾学者钮先钟先生认为：“孙子可能是第一位把计划(Planning)视为战略研究起点的人……计划又必须以权力评估(power assessment)为基础，所以孙子就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在一方面是与现代战略家完全一样。‘经之以五事’就是权力的分类(classification)，‘校之以计’就是度量(measurement)，‘而索其情’就是判断(judgement)。”钮先钟先生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发，从军事情报学的角度来看，“计”篇可作为“情报研判断”来读。(详见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86~87页，1992。)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淳淳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将《孙子》与《吴子》二者参读，可相与补充。

在七书中，就关于军事情报的内容而言，《孙子》以论述精辟取胜，而《六韬》以论述全面取胜。《孙子》以高度的理论概括，揭示了军事情报斗争的普遍规律，使其军事情报理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六韬》则以其具体而微的论述，展示了当时军事情报斗争的各方面内容，如情报侦察技术、保密技术、情报部门的组成及谍报活动方式等等，堪称当时的军事情报百科全书。

《司马法》一书，内容驳杂，掺杂了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内容、春秋时期齐国的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派大夫们加入的一些兵家言语。从军事情报思想研究的角度看，《司马法》主要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精辟的情报理论观点，而在于该书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先秦军事变革时代军事观念和军事思想的变化与演进的信息，它为我们提供了寻觅从春秋中叶以前到战国时代军事情报斗争和军事情报思想发展与演变的线索。因为，虽然自战争诞生之日起就伴有军事情报活动，但是，只有到战争活动突破“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的军礼规范而出现“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的春秋时代，围绕军事情报而展开的斗争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才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诡道”的确立，使战场上力量的角逐时刻伴随围绕“知”的智慧的斗法。

《尉缭子》是《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的著作中仅存的一部，因此，更值得重视。其兵形势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战前的对敌优势,将战的兵力布势,战时的凌敌威势。其核心是争取战场主动权,而争取主动权则须臾离不开情报的支援:未战之前,“权敌申将,而后举兵”(《尉缭子·攻权第五》);既战之后,则“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尉缭子·战威第四》)。

《三略》大约为西汉末伪托之作,其思想内容杂糅道、儒、墨、法诸家,而其所陈制胜兵略,在内在精神与思想方法上,往往与道家思想相通。书中引用《军谏》:“将谋密,则奸心闭……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来论证保密的重要,而这种对于情报保密的论述,语气却也很有些黄老之学的阴柔之术的意味。作者从道家的“贵柔”“守雌”思想出发,提出:不求先发制人,但求因敌制胜,“端未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三略·上略》),这里的“动而辄随”是以“敌动伺之”为前提的(《三略·上略》)。《三略》不仅将军事事情报置于“用兵之要”的地位来加以申明:“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而且还特别重视经济情报的重要:“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三略》围绕“粮食”这种当时最重要的经济物资的运输情况,而展开的对敌旅与敌国的情报分析:“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虑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三略·上略》)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它是先秦直至唐代中国军事思想的总结之作。第一,“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兵学的重要范畴,如奇正、攻守、主客等;第二,考察、梳理了古代兵学源流;第三,分析了自商周之际至唐代十数个重要战例。这是《问对》的独特价

值,它给我们研究了研究古代兵家军事情报思想的思路、线索:如情报在奇正、攻守、主客之变中的作用,不同流派兵学家军事情报思想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再如,书中有:“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问对·卷中》);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问对·卷下》)。明确标明“诸兵书,无出”,“千章万句,不出乎”,意在说明“虚实”、“致人而不致于人”、“多方以误之”,是《孙子》乃至全部古代兵书制胜理论的精髓。而如果我们将这三句的顺序逆向颠倒过来,即“多方以误之”→“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那么,我们从中不正可以看出情报斗争在其中的核心与关键作用吗?古今情报战的精要不是尽在于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武经七书》压卷之作的《问对》,也是我们打开古代军事情报思想之门的钥匙。